

《无产阶级世界史》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

——兼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

邢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北京 100732)

摘要: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上田茂树的《无产阶级世界史》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萌发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译介到中国,成为民国时期译本数量和发行次数最多、译介时间跨度最长、社会影响广泛的汉译世界通史。译介能够取得成功,在于这部著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史理念,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在于中国学者以续写、改写和扩写三种方式发展了原著,顺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趋势;在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作为支撑。20世纪20—30年代,党建立了一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无产阶级世界史》的成功译介表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包括思想、表达、传播、组织领导四个方面的内容。总结相关经验,可以为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无产阶级世界史》;上田茂树;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19ZDA237)。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3-0031-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3.003

《无产阶级世界史》是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①,是一部“具有冲击性的著作”^{[1]162},在东

作者简介:邢科(1982—),男,汉族,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球史等。

①《无产阶级世界史》出版于1925年4月10日。1925年以前,日本进步学者介绍了唯物史观,但完全没有涉及世界史领域。《无产阶级世界史》是日本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是上田茂树向新领域独自努力的成果。参见上田茂树.上田茂树集[M].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86:331-338.有学者认为,杨匏安的《西洋史要》是中国第一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写成的西方通史。参见杜艳华,朱佳.论杨匏安《西洋史要》对史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12):19-22.这部著作属于编译,且初版刊行于1929年,比《无产阶级世界史》最早的中译本晚一年。20世纪20年代,苏联也编辑过一些世界通史著作,但出版都晚于1925年。根据俄罗斯国家图书馆(www.rsl.ru)的数据,从十月革命到1925年(含1925年),以“世界历史”(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为主题的著作约82部,这些著作主要研究一战、党史、工人运动等方面内容,只有《通往世界历史的伟大历程》(Великие пути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 Науч. ассоциац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при Ц.И.К. С.С.С.Р., 1925)的性质无法确定。该书作者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рко-Кряжин)(1887—1931)是位东方学家,主要研究阿拉伯地区、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地的近代史,目前没有材料表明这是一部世界通史。1925年之前,欧美等地区亦无此类著作问世。就笔者掌握的材料,《无产阶级世界史》是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

亚地区产生广泛影响^①。作者上田茂树是日本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者之一,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宣传工作^[2],主持、编辑过《前卫》《赤旗》《社会主义研究》《阶级战》《无产者新闻》等革命刊物。作为党的领导者,上田茂树始终站在正确立场上,与山川均的解党主义和福本和夫的极左理论做斗争。作为革命者,他多次被捕入狱,宁死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1932年4月2日,上田在接头时被特务诱捕,不久被当局虐杀^[3]。至今没有找到尸骨。日本共产党政治家、革命家井之口政雄高度评价了上田茂树的一生:“斯大林在与列宁的遗体暂别之时曾说,共产主义者的骨骼非同一般,他们能够忍受住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保持气节。上田同志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从他身上获益良多。”^[4]作为学者,上田茂树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出版两部世界通史,即《无产阶级世界史》和《世界历史》。这两部通史于20年代后期译介到中国,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史学著作。但直到今日,中日两国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上田茂树史学贡献的论文。相反,既有成果中存在许多误读。

一、被误读的《无产阶级世界史》

在中国学界,上田茂树主要是革命烈士的形象,唯遇害一事常被提及。谈到《无产阶级世界史》在华译介,则有张冠李戴之误。1928年,中国共产党人杨贤江将该书译为中文,取名《世界史纲》,此外他还翻译了日本学者山下德治的《新兴俄国教育》。于是在许多学术资料中,《世界史纲》的作者被误认为山下德治^②。

在日本学界,现有研究主要将吕野荣太郎、服部之总等视为唯物主义史学的开创者^[5],鲜有提及上田的贡献。即便谈及他的史著,也有许多误读之辞,如五井直弘在谈到《无产阶级世界史》时做了如下论述:

1925年山川均门下的上田茂树创作了《无产阶级世界史》,1927年这部著作改定为无产者自由大学第五讲座《世界历史》出版。……近代史中,只讲了饵食、强盗和爪牙的凶残,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因此,像五四运动、三一独立运动等完全没有涉及。上田的这种叙述是根据什么做的不得其详,但可以认为是受到当时东洋史研究状况的左右……没有涉及中世以后的中国和19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众的动向,是因为没有可供参考的东洋史家的著作。^{[1]161-164}

这段论述有许多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首先,《无产阶级世界史》与《世界历史》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确实存在联系。但两者从篇章结构到书写视角都有明显差异,可以被视为两部独立的著作^③。

①除了日本和中国,这部著作也影响到朝鲜半岛。朝鲜学者崔完将书中部分章节翻译成朝鲜文刊登在《开辟》1926年第65号。参见한기형.중역되는사상,직역되는문학[J].아세아연구,2011,54(4):76.

②见童心.杨贤江著译简介[G]//慈溪文史:第3辑.1989:44.此误说流传甚广,恕不一一罗列。

③《无产阶级世界史》译者之一刘叔琴在译著“跋”里写到,“上田氏在去年又有一册《世界历史》底出版,是日本无产者自由大学讲座之一。那书实在更来得完整,更来得澈底。”参见上田茂树.世界史要[M].刘叔琴,编译.上海:开明书店,1940:155-156.《世界历史》的译者施存统也认为,“本书与柳岛生君所译的《世界史纲》,书名和著者虽然相同,但内容并不相同。”参见上田茂树.世界史纲[M].施复亮,译.上海:大江书铺,1931:译者序言2.“柳岛生”为杨贤江化名。可见,在译者看来,两部著作也存在明显差异。

其次,《无产阶级世界史》表明了反帝反殖的立场,并非完全没有触及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只是碍于当时日本的政治环境,书中并未直接提到“朝鲜”二字,而是用“XX”表示:“列强贪得无厌的侵略主义激发了爱尔兰、埃及、印度、XX 以及土耳其的英勇的民族主义运动。”^{[6]176} 当时爆发民族解放运动,又不能在日本明言的国家只有朝鲜,而且该书的中译本基本都将“XX”译为“朝鲜”,可见此隐语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歧义^①。著作也记述了中国民众的革命活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中国旧式的割据英雄正投身于原本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内战,中国的新青年与劳动者,已经与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在了一起。”^{[6]177} 这段话所指的就是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上田茂树在书中论及中国、朝鲜等国的革命活动,表明了反帝反殖的立场,只是没有使用“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的表述^②。

最后,《无产阶级世界史》受当时东洋史研究左右一说亦值得商榷。一方面,如五井直弘所言,东洋史的创立者都在其史著中呼应日本侵华,并将其合理化,而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侵略^{[1]161}。两者的立场存在根本差异。另一方面,东洋史并非书写亚洲历史的唯一参考资料^③。而且 1927 年出版的《世界历史》就较为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此时日本的东洋史研究并未发生飞跃。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世界史》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萌发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其贡献被长期忽视,内容被部分学者误读。本文将重点研究《无产阶级世界史》在中国的译介,以及其取得广泛影响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

二、《无产阶级世界史》在中国的译介

《无产阶级世界史》由绪言和十章组成。绪言阐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十章分别讲述了地球的演化和人类的产生、原始社会、私有制的产生和早期文明、古希腊罗马、封建制度、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与劳动阶级、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及战后的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该书在中国先后有四个译本。

最早将这部著作译介到中国的是杨贤江。1927 年到 1928 年,《学生杂志》发表《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和《原始人之社会与劳动》两篇文章,署名为上田茂树著(作),华因译^[7-8]。这是中国学界首次出现上田茂树的名字,华因为杨贤江的化名。这两篇文章分别译自《无产阶级世界史》的第一

①20 年代,日本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先后颁布治安维持令和意在镇压反抗天皇制和私有制的《治安维持法》,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和民主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到较大影响,回避“敏感词汇”是左翼著作常用做法。20 世纪 20—30 年代,在当局的高压下,用“XX”代表“敏感词汇”在中日两国左翼著作中都不乏例证。

②1919 年,日本报纸中并没有出现“五四运动”一词,而是称为“学生暴动”“排日暴动”或“排日风潮”,甚至污蔑为“学生义和团”,详见秦旭.1919 年日本报纸中的五四运动[D].长沙:华中师范大学,2014.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观点在日本学界仍有市场,见商金林.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五四运动[J].新文学史料,2009(3):155-160.日本最早论及五四运动的著作是野原四郎在 1960 年创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五四运动》,见狭间直树,何塔忠.日本对五四运动的研究现状[J].国外社会科学,1986(8):48-49.1925 年之前日本学界是否接受并使用“五四运动”一词尚待进一步考证。

③早在江户时期,朝鲜官修通史《东国通鉴》已在日本出版,中国的《二十四史》有一半出现了和刻本,日本学者也撰写了研究中国制度的《制度通》、考订《通鉴》的《湖亭涉笔》等著作。

章和第二章。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前往日本,但翻译工作并没有搁置。1928年3月,他密会创造社创始人郭沫若,两人讨论了学术问题。8月,《无产阶级世界史》首个中译本由创造社出版部刊行,取名为《世界史纲》。该书非常畅销,连出八版,累计发行量达到11 000册,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非常可观的。1929年,杨贤江为该书写的续作《今日之世界》由沪滨书局刊行。1930年2月,沪滨书局和百衲书店同时出版增订本《世界史纲》,包括杨译本和《今日之世界》两部分。1938年,百衲书店再版此书,但去掉了《今日之世界》。

第二个将《无产阶级世界史》译介到中国的是刘叔琴。刘叔琴,浙江镇海人,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相继任教于上虞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并参与创办开明书店。刘叔琴思想进步,在2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三篇探讨唯物史观的长文,即《精神文明底物质的说明》《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上的价值》《生活与思想》。1927年,国民政府筹建国立劳动大学,刘叔琴受邀去劳大兼课,教授世界史。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材,于是他将《无产阶级世界史》编译成中文,取名《民众世界史要》。1928年9月,该书由开明书店出版。1929年,开明书店刊行第二版,1930年和1940年又发行第三、四版,四版更名为《世界史要》^①。

30年代中前期,《无产阶级世界史》又出现了两个译本。1933年,中学生书局出版沈自元的译本,书名为《世界新史纲》。沈自元生平不详。沈译本前有何景文序,何景文的主要工作是为开华书局和中学生书局编写中学辅导资料。由此推断,沈自元应为地位与之相仿的知识分子。1936年,童年书店出版萧叔讷译本,书名亦为《世界新史纲》,该书是童年书店主编的《新时代百科全书》的第20分集。萧叔讷主要从事编辑工作,30年代为童年书店编写《新时代百科全书》,40年代任《四海杂志》编辑。四个译本的出版情况详见表1。

表1 《无产阶级世界史》四个译本的出版发行情况

译者	译著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印数	与原著关系
杨贤江 (柳岛生)	世界史纲	创造社出版部	1928年8月第1版	1 500	包括绪言和十章,比较忠实原著
			1929年3月第8版	累计11 000	
	增订世界史纲	沪滨书局	1930年2月	2 000	包括《世界史纲》和《今日之世界》
	世界史纲	百衲书店	1930年2月	2 000	
			1938年再版	3 000	仅含《世界史纲》,无《今日之世界》
刘叔琴	民众世界史要	开明书店	1928年1版	1 500	包括十章,无绪言,性质为编译,内容有删减和增加
			1929年2版		
			1930年3版		
	世界史要		1940年4版		
沈自元	世界新史纲	中学生书局	1933年3月		包括绪言和十章,扩写到1933年
萧叔讷	世界新史纲	童年书店	1936年9月	3 000	①包括十章,无绪言,内容有缩略 ②扩写第一章,详述生命演化过程及人类的产生 ③扩写最后一章,到1935年

与同一时期的汉译世界通史相比,《无产阶级世界史》的译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译本数量和发行次数最多。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1912年后译介到中国的世界

①1937年3月编印的《开明书店分类目录》中收录了《民众世界史要》。由此判断,更名为《世界史要》应在1937年之后。

通史约 13 部,其中译本最多的是韦尔斯的《简明世界史》(Short History of World),共四个译本。《简明世界史》和《无产阶级世界史》同为民国时期译本最多的世界通史。但就版次而言,前者由 5 家出版社刊行 7 次,《无产阶级世界史》则由 6 家出版社刊行 17 次,发行次数远高于同为畅销书的《简明世界史》。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提供的数据,17 次也是汉译世界通史发行次数之最。17 次刊印,估算累计发行量超过 3 万册,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第二,译介时间跨度最长。《简明世界史》的出版主要集中在 1930 年到 1934 年,时间跨度为 5 年。鲁宾逊学派代表人物海斯所著《世界史》的出版时间是从 1941 年到 1949 年,跨度为 9 年。《无产阶级世界史》的最早译本出版于 1928 年,最后一次出版是在 1940 年,前后跨度长达 13 年,成为民国时期唯一一部译介时间超过 10 年的汉译世界通史^[9]。2006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杨译本《世界史纲》,为《无产阶级世界史》在华译介续写了新篇章。

第三,影响到普通民众^①。从性质看,沈译本和萧译本是中学辅导读物,刘译本是大学教科书,杨译本及其续作《今日之世界》是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著作,其影响范围涵盖了中学生、大学生、进步青年等普通民众。这点也可以从读者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中得到佐证。从 1928 年到 1939 年,共有 4 篇关于《无产阶级世界史》的书评。这些书评有三个特点:其一,基本上为短评,如《民众世界史要》一文包括三名读者为对该书的评价,三篇评价总共 296 字;其二,多直观感受,少学术探讨;其三,对书中体现的唯物史观全部持肯定态度^②。这表明该书的读者以普通民众为主,且书中的革命思想得到民众认可^③。

三、译介成功的原因

《无产阶级世界史》在中国的译介获得很大成功,这部著作能够成为民国时期译本数量最多、发行次数最多、译介时间跨度最长、影响广泛的汉译世界通史,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①本文使用“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两个概念。知识阶层主要指知识丰富、见识广泛,且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普通民众主要指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社会影响力有限的人,是一个与“知识阶层”相对应的概念。

②参见陈望道.新近两部别致的书[J].大江月刊,1928(11);王化歧,王铸,王兰生.民众世界史要[J].开明,1929(9);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M].上海:生活书店,1934:417;少泉.世界史纲[J].青年生活,1939(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韦尔斯史著的评论以长评为主;多学理分析,译者有梁思成、向达等著名学者,作文评论者中不乏雷海宗等史学名家;书中观点充分争议,如余从予.请韦尔斯修改其著作《简易世界史》[J].天地人,1936(1);蒋逸雪.读韦尔斯世界史纲质疑[J].出版界,1944(11-12)等。虽同为畅销书,但韦尔斯和上田茂树的通史著作影响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前者主要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阶层,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

③从民国初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无产阶级世界史》出版之前,学习、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是知识阶层,相关著作种类少、理论性强,唯物史观的普及受到一定限制。1928 年之后,随着一批左翼出版机构开办,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种类、数量明显增加,且更加通俗易懂。《无产阶级世界史》的畅销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对普通民众的影响逐渐增强,为更多人了解革命理论创造了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部著作的译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到通俗、从小范围传播到更大范围传播的一个关键点。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撰文另述。

(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史理念

唯物史观重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因此,在20世纪前期,一些学者曾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这归结于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的影响。1902年,塞利格曼出版代表作《历史的经济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1905年,河上肇将其翻译成日文,书名为《新史观:历史之经济的说明》。这部著作对河上肇产生了一定影响:“因塞利格曼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的史观的我,后来在长时期中,通过经济学这个狭窄的管子,来观察这个史观……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基础上树立了唯物史观,把这独特的史观作为指南,而研究经济现象;而我呢,相反地最初就局限于经济学的领域里,只在这个领域里转来转去。”^[10]1920年,该书被译为中文,取名为《经济史观》,并影响到中国学者。李大钊认为,在名称上“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近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且仍之不易。”^[11]总之,把“物”解读为“经济”,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赞同唯物史观的中国人的一致做法^[12]。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史著只注重经济基础,忽视了人的重要性,仅把人视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人类解放始终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其学说中占据提纲挈领的地位,甚至可以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人类解放理论”^[13]。有学者将人类解放划分为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三个阶段。其中,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前提,实现政治解放要破除宗教和专制两道枷锁^[14]。而人类的政治解放正是《无产阶级世界史》的核心。一方面,上田茂树强调耶稣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因此他的思想在渴望正义的奴隶阶级中广为流传。但后来的教会背叛了耶稣,将基督教变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御用哲学,耶稣也被拥上神位。到宗教改革时期,淳朴的农民再也忍受不了教会的虚伪和背叛,纷纷揭竿而起^{[6]39-40,66-67}。这样,原始基督教被赋予了一些革命色彩,它非但不应成为精神枷锁,反而可以激起被压迫者的反抗。另一方面,反抗专制是《无产阶级世界史》一以贯之的主线。上田茂树讴歌下层民众,认为古希腊的文化成就和罗马帝国的辉煌应归功于奴隶,他颂扬斯巴达克斯起义,将农民称为反抗封建专制的排头兵,高度评价巴黎公社运动;与此同时,上田还抨击压迫阶级和投靠压迫阶级的势力。

《无产阶级世界史》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强调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歌颂劳动阶级,抨击压迫阶级是该书的重要内容。而这三方面内容又是围绕“人类解放”这一主题展开的。人类解放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正如全书最后一句话所说:“未来一定是属于劳动者的!”^{[6]179}因此,这部著作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世界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15]上田茂树的著作就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坚持为人民写历史,写人民的历史。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史理念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共鸣,这是《无产阶级世界史》一直拥有读者的重要原因。

(二) 顺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趋势

《无产阶级世界史》的译介并非是简单翻译,四个译本从不同角度对原著进行了续写、改写和扩写,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使之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16]20 世纪上半叶,革命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时代主题。而突出革命正是《无产阶级世界史》及其中译本的一大特点。杨贤江在《世界史纲》的译者序中谈到了续写原著的原因,“本书原作写至一九二四年为止。顾自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三四年间,世界已发生不少的变动,至少在我们中国最近一年间便有天大的变动出现,所以在译毕本书之后,译者即继续编译《今日世界》一书,不久当可成为本书的‘姊妹篇’而贡献于青年读者。”^①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序言的落款时间是 1928 年 4 月 12 日,也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周年的日子。再联系文中所说的“天大的变动”,可知这部续作是有指向性的。它反映了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潮流。与上田茂树相比,杨贤江更加强调整革命,将其视为战后历史发展的唯一主题,而且革命斗争变得愈发多元^[17]。

刘叔琴的译本属于编译,对原著部分内容进行了改写。译著补充了大量内容,阐述历史上的斗争,抨击剥削制度和压迫阶级。书中大段增补史实共 6 处。经研究比对,6 处引文出自 4 部著作,详见表 2。

表 2 刘叔琴译本引用其他著作情况

引文所在位置	引文内容	引文出处
第二章引用 4 段	说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生产 和分配	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一章第二节
第二章引用 1 段	批判资本主义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四编第二章
第四章引用 2 段	描述平民从贵族手中争取权利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五编第二十五章第二节《一种新的国家》,其中第二段引文又引自韦尔斯本人的《迄奥古斯都之死的罗马简史》
第四章引用多段	批评罗马统治阶层的穷兵黩武	陈衡哲《西洋史》第六章《罗马古文化》
第六章引用 1 段	叙述路易十四的内政外交,为后 文讲法国衰弱和革命做铺垫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八编第三十四章第五节《欧洲大君主国的 显赫》
第六章引用 1 段	讲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八编第三十四章第三节《英吉利共和国》

纵观 6 次引述,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在民国时期颇具影响。陈衡哲的《西洋史》是中国学者独立探索世界史的代表作,至今仍被视为“民国学术经典”。摩尔根的学术地位无需赘言,波格达诺夫在 20 年代被誉为“真挚的革命家”和“渊博的学者”^[18]。从来源看,引用著作来自中国、苏联、欧洲、美国,可谓兼容并蓄。从性质来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国的优秀学术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刘译本融通各种在当时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资源,为历史上的革命活动提供更加充分的史实支撑。作为国立大学的教科书,尽管刘译本删减了一些“在中国不该说的”,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精髓,突出革命这一时代主题。正如作者所言,这仍然是一部“资被治”的书^[19]。

沈译本和萧译本对原著进行了扩充,将记叙时间延长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且都加重了中国革命的分量。沈译本在最后一章增加了三个标题。第一个标题是“世界经济第三期”,认为从 1928 年开

^①参见上田茂树.世界史纲[M].柳岛生,译.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9:译者序 3. 正式出版时,该书名称为《今日之世界》。杨贤江在《增订世界史纲》中写到,“译者自己又搜集材料……写作本书的补编”。参见上田茂树.增订世界史纲[M].柳岛生,译.上海:沪滨书局,1930:译者序 3. 因此,本文采用作者本人最后的说法,将《今日之世界》视为可以代表杨贤江思想的著作。

始,世界经济进入一战结束后的第三个时期,经济危机重创资本主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没落,终是很快的了”^[20] 171-172。第二个标题讲述苏联的五年计划和苏联发展的欣欣向荣。第三个标题是“中国的革命运动”。作者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1933年长城抗战。文中歌颂了东北义勇军等抗日组织的不屈不挠,并将中国革命上升到世界反帝运动的高度,“一旦中国民众完成了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使命,全世界将要受到影响,而有巨大的变动”^[20] 182-184。三个标题存在内在联系,前两个标题展现了资本主义衰落和社会主义兴旺发展的历史趋势,第三个标题则是将中国革命置于这一大趋势中进行考察,突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萧译本将记叙时间延长到1935年。此时,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团结一致,联合抗日。在论述中国革命时,萧叔纳将抗日救亡作为重要主题,在全书的最后一句写到,“全国人民愤怒之火焰,总有一天会起来,为了拯救自己的危亡而奋斗吧”^[21]。

有学者认为,“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发展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的相关性,于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逐渐高涨起来”^[22]。四个译本对原著的续写、改写和扩写,紧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紧扣革命这个时代主题,用唯物史观阐述世界历史演进,并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放在列宁所说的“大的历史时代”中进行思考,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的相关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到民众认同,所以《无产阶级世界史》的中译本成为多次再版的畅销书。

(三) 依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展开所谓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则团结各种进步力量,建立了一条文化统一战线,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文委),用以“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23]。根据这一精神,中宣部于11月在上海成立文委,潘汉年任书记,杨贤江、李一氓、朱镜我等任委员。1930年起,文委先后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等八个进步组织,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由文委统一领导。

文化统一战线将各种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左翼人际传播网,这为《无产阶级世界史》的译介创造了有利条件^①。文委创办的沪滨书局刊行了《今日之世界》和《增订世界史纲》。由杨贤江介绍入党,并与其关系密切的高尔松、高尔柏兄弟于1929年创办平凡书局。1930年,书局因出版进步书籍被查抄。随后,兄弟二人将平凡书局更名为开华书局。1931年,开华书局又挂出中学生书局的牌子,后者主要刊行普及读物^[24]。1933年,中学生书局出版沈译《世界新史纲》,高尔松的哥哥高尔梁(高圮书)即为该书的发行人。潘汉年、李一氓、朱镜我是创造社成员。成立出版部之前,创造社的书刊主要通过泰东书局发行。1925年,泰东书局编辑沈松泉与友人开办了被誉为“创造社的托儿所”的光华书局,潘汉年与书局保持着密切关系。1933年,光华书局编辑李白英自办童年书店^②,并策

①关于左翼人际传播网的形成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中起到的作用,详见邢科.左翼人际传播网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扩散——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为中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7-106.

②李白英,原名李澄,江苏无锡人。早年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共同创办平民夜校。1927年任《革命军日报》发行处主任。1930年前后进入光华书局做编辑,1933年创办童年书店。解放后从事教育、编辑及文学创作。

划出版《新时代百科全书》，萧译《世界新史纲》即为其中一个分集^①。此外，一些左联的骨干成员（如茅盾、夏衍等）与开明书店合作密切^[25]，所以开明书店也是文化统一战线的一个环节，成为译介《无产阶级世界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之，刊行《无产阶级世界史》中译本的出版社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左翼人际传播网的结点，是文化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这部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在华译介的成功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四、从《无产阶级世界史》的译介看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界对话语体系有着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以社会科学的规范认识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和表达方式”^[26]。有学者认为，“话语体系是反映话语主体的价值、利益与权利的意义表达系统”^[27]。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话语体系’是指一种独立的或几种若干相关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包括概念、术语、范畴、基本原理、叙事框架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28]。思想和表达是上述理解的共有因素，但话语体系的内涵不止于此。大革命之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为基础，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著作和刊物，这些进步书刊构建起一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党牢牢掌握了话语权，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使革命真理传播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世界史》的译介是当时话语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通过总结译介过程和成功经验，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应至少包括思想、表达、传播、组织领导四个方面的内容。

从思想方面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无产阶级世界史》用史实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史理念，探寻人类解放之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其中译本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分量，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换言之，《无产阶级世界史》及其中译本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这是话语体系能够建立起来的首要原因。

从表达层面看，《无产阶级世界史》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易于为民众所接受。其中译本在继承原著语言风格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化的表达形式。以刘译本为例，原著讲地球演进时引用了基督教创

^①中学生书局、光华书局、童年书店的负责人关系密切。柳亚子、高尔柏和沈松泉是朋友。1931年，柳亚子和高尔柏筹建中学生书局，中学生书局就附设在沈松泉的光华书局里。因为这层关系，与柳、高熟悉的谢冰莹结识了时任光华书局编辑的李白英和顾凤城。1932年，谢冰莹与顾凤城结婚。除新郎新娘外，结婚仪式只有三个人参加，其中就包括证婚人柳亚子和嘉宾李白英。当天婚宴只邀请了约十位客人，其中包括柳亚子、高氏兄弟、沈松泉和李白英。柳亚子与几家出版社都保持合作关系，他为中学生书局和光华书局编写多部著作，又为童年书店的《新时代百科全书》题写了书名。柳亚子是联系几家出版社的核心人物，而他又是左翼文化的重要支持者。参见沈松泉《光华回忆》余话[J].古旧书讯,1983(2);李白英.我所知道的谢冰莹[J].艺潭,1982(1);孔尊.谢冰莹与顾凤城//杨之华.文坛史料[G].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342-344.

世说,译者在这一部分增加了盘古开天辟地的中国神话做进一步的对比说明。此外,刘译本还使用了“东海三为桑田”“尊王攘夷”“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中国式表达,用中国话语讲述世界历史,拉近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读者的距离。

从传播层面看,学校(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等)、学会(如创造社、左联、社联等),以及众多左翼出版社,是左翼人际传播网的支点。在这些支点的支撑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播网最大程度地整合了各种进步力量。从刊行《无产阶级世界史》中译本的出版机构来看,其中包括党组织创建的出版社,如沪滨书局;包括共产党员开办的私营出版社,如中学生书局;也包括进步人士主持的出版社,如开明书店、童年书店等。传播网的支点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形的支撑,传播网整合的各种力量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从组织领导层面看,建设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术语为基础的话语体系^①。但这套话语体系并非共产党人专有,国民党、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无特定政治倾向的人都会使用这套话语。国民党、伪马克思主义者常常盗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混淆视听,试图窃取革命话语权。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既会受到国民党的外部压力,又会受到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破坏。例如,刊行杨译本的创造社出版部被国民政府查封,沪滨书局曾受到托派的严重干扰^[29]。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译介工作才能战胜各种困难,《无产阶级世界史》才能成为民国时期译本数量和发行次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社会影响广泛的世界通史,成为话语体系建设的一块基石。

《无产阶级世界史》的成功译介启示我们,思想、表达、传播、组织领导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想是“说什么”,表达是“怎么说”,传播是“说出来怎么传”,组织领导则如同一条线,将前三个要素串联起来,确保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当今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同样离不开这四个方面。在思想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核心,阐释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感受到科学理论的真理伟力。在表达上,转变表述方式和表达风格,运用生动的形式、鲜活的内容、群众的语言,生产出接地气、形式潮、不枯燥的思想理论产品,使群众真正喜闻乐见;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在传播上,发挥好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国际性学术组织、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国际学术会议等支点的作用,形成一张多元立体的传播网。通过这张网络将我国代表性成果译介到国外,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扩大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组织领导方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话语体系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在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增强中国思想的国际影响力。

^①详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以马克思主义术语为基础的话语体系”的使用者也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这一概念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M].東京:青木書店,1976.
- [2] 不屈の生涯 戦前の党幹部のたたかいかい<5>;上田茂樹[N].赤旗,1972-08-16(7).
- [3] 吾党中央委員、同志上田茂樹虐殺さる! [N].赤旗,1932-09-10(1).
- [4] 井之口政雄.上田茂樹同志をしのぶ[J].前衛,1956(7):104.
- [5] 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日本历史讲座:第八卷[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08.
- [6] 上田茂樹.無産階級の世界史[M].東京:文化學會出版部,1925.
- [7] 上田茂樹.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J].华因,译.学生杂志,1927(6):13-15.
- [8] 上田茂樹.原始人之社会与劳动[J].华因,译.学生杂志,1928(2):33-35.
- [9] 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14-18.
- [10] 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册[M].储元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11.
- [11]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J].新青年,1920,8(4):1.
- [12] 单继刚.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5.
- [13] 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2(8):4-23.
- [14] 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阶段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48-52.
- [15] 习近平.始终与人民心相印共甘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J].人民论坛,2012(33):6-7.
- [16] 张本林.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当代使命[N].湖北日报,2010-05-27(12).
- [17] 邢科.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J].天津社会科学,2014(3):140-144.
- [18] 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M].施存统,译.上海:大江书铺,1929:译者序言 3.
- [19] 上田茂樹.民众世界史要[M].刘叔琴,编译.上海:开明书店,1928:序 8.
- [20] 沈自元.世界新史纲[M].上海:中学生书局,1933.
- [21] 萧叔讷.世界新史纲[M].上海:童年书店,1936:113.
- [22] 阿夫里·德里克.历史与革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7.
- [23]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G].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896.
- [24] 陈江.平凡书局主人的不平凡生涯[J].出版史料,1992(1):28.
- [25] 夏衍.难忘的开明书店[N].人民日报,1985-10-31(8).
- [26]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2):72-79.
- [27] 赵士发.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双重构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3-31(6).
- [28]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M].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2016:381.

[29] 关山.杨献珍研究资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4.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orld History of Proletariat and Its Influenc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Xing Ke

(General Offic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Abstract: Ueda Shigeki is not only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revolutionist and a scholar. His monograph “The World History of Proletariat” was an important book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of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late 1920s, and it is the Chinese world history with the longest translation period in light of its many copi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uccessful introductions depend on the support of these three reasons, which are: Firstly, The World History of Proletariat embodi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hat approved by common people; Secondly, Chinese translations developed original work by continuing, rewriting and expanding, which conformed to the history trend of develop and popularize Marxism. Thirdly, introduction depended 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led by CCP. The successful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shows that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includes four factors: thought, expression, dissemination, and leadership. Summarizing these experience w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The World History of Proletariat; Ueda Shigeki; Marxism historiography; World history;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责任编辑:许志敏)